

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综述

吕成龙

2013年10月15至16日，由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主办的“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金台饭店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共计69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及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大会收到论文20篇，有19位代表在大会上作了学术发言。15日上午，全体与会代表参观了在故宫博物院延禧宫西配殿古陶瓷研究中心陈列室特为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而举办的“色彩绚烂——故宫博物院钧窑瓷器展”。15日下午及16日全天，在金台饭店报告厅进行了六场研讨。代表们围绕着钧窑的性质、钧瓷的品种、钧瓷的始烧年代、官钧瓷的烧造年代、有关钧窑的文献记载、钧窑的定名、钧窑遗址的调查及考古发掘、钧瓷的科学检测及钧窑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简要分类叙述如下。

（一）关于“钧窑”的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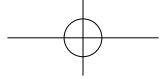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有代表在发言中谈到，历史文献在谈论河南禹州的瓷窑时，常记为“均窑”或“钧窑”，究竟为什么？这两种写法是否都可以？在这里，“均”、“钧”是否可以通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有关今河南省禹州市烧造瓷器的记载，最早约见于明代中期文献。明代晚期，记载禹州市烧造瓷器的文献逐渐增多，而且出现了“均州”、“均窑”、“均州窑”之名。问题的关键是今河南省禹州市在历史上从未被称作“均州”，其在宋代称“阳翟县”，金代大定二十四年(1184)改名“钧州”。万历三年(1575)，因避讳万历皇帝朱翊钧名字中的“钧”字而改称“禹州”。不管钧窑得名于钧州还是钧台，明代万历三年以后直至明代灭亡，人们将“钧窑”、“钧州”中的“钧”字写成“均”，可能也是因为避讳。但明代灭亡以后，直至今日，仍有人将钧窑的“钧”字写成“均”，实属不应该。

（二）关于钧窑的性质

以往有研究者认为钧窑属于民窑，也有研究者认为有官、民窑之分。此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钧瓷有民钧瓷(亦称“器皿类钧瓷”)和官钧瓷(亦称“数码类钧瓷”、“陈设类钧瓷”)之分，官钧窑不应是空穴来风，应建立在民钧窑基础上。

（三）关于钧瓷的品种

代表们一致认为，钧瓷主要以其与众不同的釉——俗称“钧釉”而闻名于世。这是一种不透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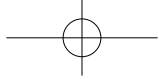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乳浊釉，按釉色可分为天青、天蓝和月白，或于天青、天蓝、月白釉上施以紫红色斑，又有玫瑰紫、海棠红等铜红窑变釉。特别是所创烧的铜红窑变釉，变化万千，绚烂至极，成为钧窑瓷器扬名海内外的最主要因素。一部分钧窑瓷器的釉面上有自然形成的“蚯蚓走泥纹”，更为钧窑瓷器增添了几丝神秘色彩。关于“蚯蚓走泥纹”的形成原因，以往人们普遍说成是因为器物成型后干燥和素烧时胎体产生裂纹、施釉后入窑烧成至釉层熔融时釉料填充胎体上的裂纹所致。15日上午，古陶瓷研究中心特邀请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钧窑的刘建军、刘志军先生在延禧宫给与会代表进行了现场施釉演示，揭开了钧瓷釉面“蚯蚓走泥纹”形成的谜底。演示结果表明，“蚯蚓走泥纹”系胎体施釉后晾干时釉层产生不规则开裂、然后入窑烧成时所致。也就是说，在器物施釉后晾干时，釉面上已现出“蚯蚓走泥纹”的雏形。据刘建军、刘志军兄弟介绍，形成“蚯蚓走泥纹”的关键是控制好胎体的素烧温度（一般为980—1000℃）和釉浆的颗粒细度，素烧温度过高过低或釉浆的颗粒过粗、过细均不会形成“蚯蚓走泥纹”，以今天的烧造技术完全可以做到人为控制“蚯蚓走泥纹”的有无。

（四）关于钧瓷的始烧年代

长期以来，关于钧瓷的始烧年代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既有代表在发言中坚持钧窑初创于北宋初期的传统观点，也有学者认为钧釉瓷的创烧不会早于北宋末年，这些学者主要通过窑址、遗址、窖藏等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实物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后作出推论。大家认为后一种观点比较接近事实。当然，这一说法尚有待于更可靠的考古资料、特别是纪年墓出土物和署有确切年款的器物来证实。也有代表在发言中认为钧瓷创烧于金代，钧瓷是对汝窑工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天青釉汝瓷与钧釉瓷的发展演变过程有密切关系。有代表发言认为，现有考古资料不能证明唐代花釉瓷与钧釉瓷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但也有代表的观点恰相反，认为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

（五）关于官钧窑瓷器的烧造年代

关于官钧窑瓷器（亦称“陈设类钧瓷”、“数码类钧瓷”）的烧造年代，目前意见尚难统一。2004年汝州制药厂基建工地出土了一批官钧瓷器标本后，人们发现这些标本与1974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钧台附近的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官钧瓷标本有明显不同。1974年发掘出土的官钧瓷，工艺较精细，形体较俊秀，被称为“精致型”官钧瓷，有代表在发言中认为这类官钧瓷烧造于北宋徽宗时期。而2004年出土者，工艺较粗糙，形体较笨拙，被称为“粗放型”官钧瓷，有代表认为这类官钧瓷烧造于元、明时期，推测可能是对“精致型”官钧瓷的仿烧。也有代表在发言中认为“精致型”官钧瓷烧造于明代成化年间，而“粗放型”官钧瓷烧造于明代永乐、宣德时期。还有代表认为，元代末期钧窑一定能烧造出精致的花盆类陈设瓷，以至于明代朝廷决定在禹州订货，“精致型”和“粗放型”钧瓷是不同时期的订货。



（六）有关钧窑文献记载的新解读

代表们一致认为，历史上缺乏有关钧窑的文献记载是造成钧窑瓷器研究中出现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明初曹昭撰《格古要论》中为何记载了10多个古代著名瓷窑而不见有钧窑，有代表给出的解释是，该书作者记载的都是明代以前的著名瓷窑，窑名前一般都加“古”字，而官钧窑主要兴盛于元末明初，作者认为是当时瓷窑的产品，故不记之。

（七）关于钧瓷的科学检测

代表们普遍认为，目前对钧瓷的化学组成、显微结构及年代测试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已经不少，但由于均各自为之，未建立起标准体系，有些标本的来源亦不明确，缺乏庞大的数据库支持，加之测试本身所带来的误差，致使测试结果很难令人信服，故只能供人参考。因此，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整合和加强。

（八）关于钧窑的研究方法

有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在钧窑历史研究方面亟待进行深刻的方法论反思。应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整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人力、物力，对钧窑科技、艺术、文化等开展宏大而细微的综合性整体研究。认为过于注重考古材料、过于依赖历史文献、过于简单化地偏信科技测试，都很难得出正确结论。

总之，代表们一致认为，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举办的这次“色彩绚烂——故宫博物院钧窑瓷器展”，堪称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举办的最为成功的钧窑瓷器展览，该次钧窑学术研讨会也达到了预期目的，促进了钧窑研究的深入开展。

诚如故宫博物院宋纪蓉副院长在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中所指出的，钧窑探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诸多有关钧窑的学术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指望召开一两次学术研讨会就全部解决。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为举办此次学术活动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充分准备，举办此次学术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给大家搭建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在钧窑研究方面给出一个助推力。我们深信，随着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力量的逐步加强，笼罩在钧窑研究中的一层层神秘面纱必将被逐层揭开。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责任编辑：项坤鹏)